

醉驾欠薪人罪民心所向

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修正刑法,将醉酒驾车、飙车、恶意欠薪入罪,得到了全社会高度评价。连日来,无论是高端专家论谈,还是普通百姓私语,基本上是异口同声。由此可见,这一关注民生的刑法修正是民心所向。

众所周知,多年来,醉驾、飙车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马路杀手”,尽管交警部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制止、堵截、检测、整治,也采取了拘留、罚款、扣分、吊销驾照等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但仍然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2009年全国酒后驾

车就达31.3万起,车轮下的惨案令人防不胜防,从网上看到的几起醉驾、飙车“杀人”视频,更让人不寒而栗。

醉驾、飙车已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已到了不用重典不足收效、不足平民愤的地步。过去,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但必须是行为人产生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这次刑法修正增加的规定是只要醉酒驾车、飙车的行为存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同样

程度上遏制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醉驾、飙车犯罪。

恶意欠薪犯罪,这也是当今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曾专门组织过律师讨薪团,各级政府也曾制定过无数个规章遏制欠薪,诸如欠薪多少将取消资质甚至逐出市场、欠薪者将被记录在信誉黑名单,银行不予贷款等等。但是,这一系列行政措施对抑制恶意欠薪都显得如此乏力。欠薪,这个社会的肿瘤仍然在继续扩散、恶化,导致为讨薪跳楼的有之,雇黑社会帮忙的有之,

造成恶性事件的有之,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影响极坏。温家宝总理不是还曾亲自为民工讨薪吗?这就可想而知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

对一些危害社会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违法行为,行政干预和民事调解又无济于事、无力解决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将其入罪,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刑法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驾护航和对民生的保护,也有利于对这类不法行为的预防和打击,这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惯例。

吕联义

手机实名制尚需加强隐私泄露防控

手机实名制开始实施,消费者购买手机卡必须持有身份证,老用户需补登记信息。不过目前各运营商执行的政策不一,由于担心失去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客户,运营商不会对未登记身份信息用户强制停止手机服务。(8月31日《新京报》)

博弈了五年的手机实名制终于尘埃落定。实名自然有实名的好处,譬如打击手机色情信息、严防手机诈骗等,加之中国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数量,以实名制强化监管也是大势所趋。按照专家的说法,除了防止商业广告的骚扰外,未来电子商务等都需要用户的身份识别,有了实名制后有管制地开放这些信息,将更好地推动手机网的发展。

但就眼下的情势来说,实名制带来的隐私泄露风险同样值得关注。手机实名制的初衷在于保护用户隐私,减少不良信息,然而,实行手机实名制也许会加剧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此前,电信运营商从业人员向SP违规出售用户资料的丑闻,便是最好的例证。

有一个细节须引起关注,现在,大量预付手机卡都是在报摊和商贩处购买,实行实名制后,个人在这些地方购买手机号码,并留下身份证信息,难免不被商家利用。

我们当记得某些证券机构去偏远地区购买死人身份证用以开户操纵股票的“奇闻”,同理,手机实名制在管制非法信息与非法渠道的功用上,也许并不那么乐观。在IT界有个通识:技术革新远超前政府管制更新的速度。手机实名制这堵防火墙,管住了君子,却未必防得住小人。犹记得在讨论火车票实名制的时候,铁道部相关专家学者及领导一致认为,“实名制并不能增加一张票,可能给旅客增加更多的时间成本,增加了麻烦;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彻底消除黄牛党”。那么,在铁路部门并未大规模推开的实名制,何以到了手机领域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我支持实名制。但是,当务之急也许不是争辩实名制的利弊,而是全力堵住因实名制而可能引发的隐私泄露风险。

新华网



新闻漫画

缺一不可

新学期临近,中小学生在陆续回校报到,各地教育部门纷纷重申校园安全问题,要求学校在人防、技防方面配足配齐。然而就在开学前夕,广州部分学校周边发生的学生被勒索殴打事件提醒我们,校园安全绝非仅限于学校围墙内。在强化学校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同时,更需要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作,共建长效机制,从内到外编织起一张严密有效的校园安全网。

新华社

“粗人”警察的误会不是免死金牌

8月28日,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4起采访记者遭警察扣留事件。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已就此事公开道歉,一位警方官员道歉时说:“我是粗人,请文化素质高的记者理解。”(8月29日《新京报》)

伊春空难,遇难者尸骨未寒,却连续发生数起警察扣留记者事件,不免令公众浮想联翩。最有趣的是当地相关部门和警方的致歉:伊春市官员说,“这是误会”。“误会”在公共事件中的意思约等于大水冲了龙王庙,既表明了利益原则,又重申了道德立场,谁要是揪住“误会”不放,反倒显得不谙世事不解风情——但诡异的是,当记者在车上询问被扣留原因时,对方称“抓的就是记者”。

当地警方的致歉更可入选汉语语言水平测试中的“阅读理解”单元:崔姓局长

说,“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在这次事件中受委屈的记者表示歉意。”发生这次不愉快事件,谁都不愿意看见,“我刑警出身,是个粗人,希望文化素质较高的记者们能够理解。”抑扬顿挫,滴水不漏,但其间的悖论却耐人寻味:记者又不是局长抓的,怎么以“个人名义”致歉?局长的刑警出身,与“是个粗人”毫无逻辑关联,硬要联系上,刑警们答应吗?粗人或者文化素质高的人,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孰对孰错,不能以身份撇清,“粗人”就可以随便抓人,这个道理谁能“理解”?

警方冲在公共事件第一线,其情可鉴,勇气可嘉。但既然是公共事件,关乎公共利益,寄寓着公众权利与自由的各种诉求,自当恪守程序正义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客观公正地掘进真相——而不能凡事拉出警方当挡箭牌或者封锁墙,任由

权力裁量着事实的真相。

有些公共事件,未必有多少“私隐”,权力者却偏要遵循翻云覆雨的惯性,臆造出种种“雷池”,满足或成全自己掌控事态、左右真相的嗜好。成功了,就以为真相果真成了自己打造的“限量版”;不成功,反正还有“误会”般的免死金牌护身。

公共事件中的私隐与避讳,说到底,还是不受制衡的权力游荡出的猫腻。8月27日,温家宝总理刚刚强调,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要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看来,舆论监督要避免动辄“被扣留”的尴尬,还须堵上“误会”的借口,让权力无法遮盖住公共事件中的私隐与避讳——让该说话的人说话,公共事件才不会沦为一出宫廷大戏。

摘自《郑州日报》

第五届安利纽崔莱少年 NBA 年度总冠军出炉

2010年8月25日,“2010安利纽崔莱少年 NBA”总决赛经历了台北站激烈的比拼后,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时刻。台北站比赛1分落后的虎跃队最终以65:40力克龙腾队,并以两场总决赛112:88的总比分,赢得2010安利纽崔莱少年 NBA 总冠军。此外,虎跃队8号、年仅12岁的台北少年崔时造凭借全程出色发挥,摘得“最有价值球员”(MVP)桂冠。

虎跃队12名小球员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台北。安利纽崔莱将资助这些一路过关斩将的篮球天才少年于明年前往美国洛杉矶,体验激动人心的“NBA全明星周末”,包括观摩NBA全明星嘉年华、新秀挑战赛、第60届NBA全明星赛,并会见美国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和安利纽崔莱少年 NBA

推广大使、魔术队主力中锋德怀特·霍华德,还将与美国少年 NBA 冠军队进行交流比赛。龙腾队12名小球员同样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台北4个城市,输掉这场“德比”之战,他们虽无缘全明星周末,但也得到一个纽崔莱大礼包作为安慰奖。

安利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颜志荣先生表示,安利纽崔莱少年 NBA 挑战赛今年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项活动为中国青少年提供了原汁原味的 NBA 体验和篮球乐趣,推广了安利纽崔莱“运动+营养=健康”的品牌理念,为更多热爱篮球的少年提供了切磋球技、加强沟通、增进友谊的机会。很高兴今年首次将活动延伸到台北,并邀请到 NBA 明星德怀特·霍华德担任“少年 NBA 推广大使”,明年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把活动推向新的高度。

两岁女坐拥别墅刺痛房价公平

妞妞今年只有两岁,然而其爷爷奶奶最近给她买下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价值近400万元,作为妞妞将来的嫁妆。只有两岁就有幢400万元别墅的小女孩,也是南京媒体爆出的“南京最小而且最富的房二代”。(8月29日《南京日报》)

如果此女童生于大富之家,资产亿万,别说400万的别墅,纵是更贵豪宅,媒体恐怕也提不起兴致来报道。但是,这个妞妞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自垄断行业,家里已经有4套房两辆车,现在再加上这栋别墅,就不免引发舆论关注和民众的议论了。

原因很简单,一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的收入向来为公众所诟病,据统计,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往往是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两三倍,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5-10倍。这个女童的上两代都在垄断行业从业,别墅就成为垄断行业高工资的标本,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

象征。两代垄断行业惠及第三代,给人以“特权世袭”的感觉。因此,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分配还是从微观的权利方面,都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

女童别墅背后还隐含着另一个关注点,即高房价。从这位女童家有4套房、两部车、一栋别墅的情况看,女童家属于中国房市获益的利益阶层。这也意味着,垄断行业不仅在初次分配中获益良多,也通过初次分配的特权,赢得“驴打滚”的法定特殊利益。这就使得分配更为不公,从现实向未来燃烧蔓延。中国房市的这种超代际消费,不仅抬高了房价,酝酿了中国房市的潜在危机,也使“房二代”有可能成为缺乏奋斗精神的寄生者。

可见,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个普通的人、一件平凡的事,只要牵涉到收入和住房这两件典型的社会热点,就会演化为公共事件。核心所在,是人们对社会公平和平权待遇的期待。摘自《郑州日报》